

文本内外:《钟鼓楼》英译传播多元行为者之“众声”研究

邵璐¹ 李伟超^{1, 2}

(1.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西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文学作品国际传播过程中,诸多翻译行为者在文本内外留下显著或隐晦的声音。在译文内部,译者消解原作者声音,发出隐形和显形声音,生产兼具可理解性和陌生性的译文。在译文外部,译者、编辑、装帧设计师、插画师等翻译行为者通过内副文本发声,形塑“世界性”和“民族性”协调的译本形态。书评人、出版商于外副文本发声,突出小说的“人性”和“命运”主题意义。翻译行为者在不同渠道各自发声,共同建立并维系“翻译契约”,为翻译传播带来积极影响。

关键词:文本声音;语境声音;翻译行为者;《钟鼓楼》;英译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4-0118-12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取得积极进展,不少译作在国际文学舞台上获得认可与关注,其中,《钟鼓楼》英译传播便是值得关注的典型案例之一。该小说是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的首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亦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7年,译林出版社成功输出英语版权,由新加坡翻译家程异(Jeremy Tiang)完成翻译。2021年,英译本由美国最大的翻译文学出版商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Amazon Crossing),以*The Wedding Party*为名面向全球出版发售^①。该译本入围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2022年度“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s)名单,同时与残雪的《赤脚医生》、双雪涛的《艳粉街》英译本一同列入《纽约客》(*The New Yorker*)2022年度书单。国内评论家称《钟鼓楼》饱含着“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何镇邦,1985:135)。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印记,使其在国内外文学艺术界保持旺盛

收稿日期:2024-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作品英译与国际传播研究”(21BY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璐,女,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研究。

李伟超,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英译研究。

①《钟鼓楼》另有英语节译本,收录于1993年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陈家宁主编*Them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当代小说专题文选》),译名为*The Bell and Drum Tower*(编者未提供译者信息)。

引用格式:邵璐,李伟超.文本内外:《钟鼓楼》英译传播多元行为者之“众声”研究[J].外国语文,2024(4):118-129.

的生命力。

在文学作品国际传播过程中,原作自身优秀品质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编辑、书评人、出版商等各类翻译行为者(translation agents)在翻译生产、流通、传播等各个环节分别扮演重要角色,控制和影响翻译全过程(邵璐等,2021:96)。即是说,文学国际传播受多主体、多维度等复杂性因素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从社会文化宏观语境关注文学翻译传播。当前,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强大内需驱动下,重点关注译介成功个案,探析多元翻译行为者在译本内外的具体行为特征,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鉴于此,本文拟从声音角度,聚焦多元化翻译行为者,考察其在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如何发声,合力促进《钟鼓楼》更有效地走向英语世界。

1 翻译与声音:从译者“独声”到多元行为者“众声”

“声音”(voice)这一概念最先由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近年来,翻译声音的范围不断扩展,除作者和译者之外,出版商、编辑、评论家等行为者因素均得到了重视。赫曼斯(Hermans, 1996:27)认为翻译叙事话语中除原文叙事者声音外,还含有第二种声音,即译者话语在场(translator's discursive presence)的表征,可命名为译者声音(translator's voice)。若译文出现以下三种情形,即表明译者直接介入文本,彰显译者声音:(1)翻译造成语用移位;(2)涉及对语言本身的自我指涉;(3)由于“情景多元决定”而别无选择(Hermans, 1996:23)。上述主要存在于副文本的译者声音,“可能影响目标文本的连贯和衔接”(Millán-Varela, 2004:39),是一类明显且直接的“译者旁白”(translatorial asides)(Hermans, 2014:299)。奥沙利文(O'Sullivan, 2003:202)对赫曼斯译者声音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译者声音还可能体现在译文叙事层面,是没有被原文叙事者声音同化的声音,可称为“翻译中叙事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narrator of the translation)。上述学者对译者声音的概括和分类为探讨译者声音研究奠定基础。

从社会翻译学角度来看,翻译事件(translation event)包括从翻译发起到翻译接受的各个环节(Chesterman, 2007:173)。广义翻译过程概念进而扩展到涉及翻译生产全程的连续事件链,译者仍是语言和文化转换的核心,而其他行为者对翻译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也会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诚然,包括译者、文学经纪人、书探、编辑、校对员、装帧设计师、销售代理商甚至原作者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为者,共同为翻译贡献力量。通过介入译本内部或操控译本外部,“每个行为者均会发出‘声音’,即一种主观表达的潜力”(Greenall et al., 2019:641)。从这一角度看,在翻译事件中必然存在着多种声音,译者的“独声”进而可拓展为多元翻译行为者的“众声”。

阿尔夫斯塔德等(Alvstad et al., 2015:3-5)基于声音与文本之位置关系,对各种声音

进行全面归纳和分类,主要划分为文本声音(textual voice)和语境声音(contextual voice)。前者存在于译本内部,包括叙事者声音(voices of narrators)和人物角色声音(voices of characters)两类叙事声音以及译者以文本形式显现的声音(也即译者话语在场,例如译者对各类专有名词、文化负载词、自我指涉语言项等语言措辞层面的介入);后者则是翻译行为者为译本的生产、推介、评论而发出的声音,主要出现在译本外部。阿尔夫斯塔德等(Alvstad et al., 2017:6-7)进一步将文本声音中的第三类声音延扩为包括译者、原作者、编辑、文字编辑、校对员等在内的所有翻译行为者声音;语境声音可反映在评论、学术研究、译者序、脚注、编辑与译者及其他相关方的通信、各类调查和访谈中的数据等。显然,文本声音和语境声音均与副文本存在一定关系。文本声音集中反映在译文本身及其内副文本,而语境声音存在于各种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声音可视为翻译行为者隐藏或明示在译本内部或外部的在场性话语,副文本则是其载体之一。从该角度出发,副文本为形,声音为质。此外,各类声音背后存在着某种“翻译契约”(translation pact),即出版商和译者邀请读者以“把译文视为原文”的特定方式阅读译文(Alvstad, 2014:271)。这种邀约机制可作为理解译者与读者之间对话关系的一种方式(Valdeón, 2022:226),对吸引读者注意力、引导读者阅读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文本声音概念整合语言和叙事层面的译者声音,吸纳其他翻译行为者的声音;语境声音则与翻译过程的社会学特征密切相关。如此分类,强调了翻译几乎从来不是单一声音之结果(Faria et al., 2023:4)。多元翻译行为者声音可覆盖广义翻译过程的主要环节和主要行为者,有助于深化翻译事件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文本声音和语境声音的分类为框架,探析多元翻译行为者在《钟鼓楼》英译本内外如何发出声音,从而为目标语读者生产译文、呈现译本,并推动翻译传播。

2 文本声音:消声与发声

针对叙事层面文本声音,即叙事者声音和人物角色声音,一般可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洞悉叙事结构改变、叙事视角转换、人物角色话语扭曲等方面,探明叙事声音。目标语读者往往不会进行原文和译文对比式文本细读,因而较难发现叙事层面文本声音。对于语言层面的文本声音,在进行诸如专有名词、历史典故、文化负载词转换时,翻译行为者可能通过添加注释、使用括号等策略发声,以补充必要文化信息,保证译文流畅与可读性,促进读者理解和接受(Hermans, 1996:28-29; Alvstad et al., 2015:5)。此外,从译文语言所体现出的异质性(foreignness)和陌生性(textual strangeness)也可追踪声音痕迹(Millán-Varela, 2004:43)。以上语言层面文本声音是读者阅读过程中较易感知的声音,本文主要考察此类文本声音。

2.1 消解作者声音:保持语言连贯性

《钟鼓楼》英译本未出现任何脚注、尾注等,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不存在翻译行为者的文本声音。若目标文本中不存在某些能直接揭示翻译行为者声音的元素,则可对比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以呈现“对作者声音的改动、消音、夸张、模糊或其他扭曲”(Munday, 2008: 14)。《钟鼓楼》被誉为“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学者小说”(邹平, 1986: 110),典型特征之一就在于小说使用了大量体现北京韵味的方言土语、历史典故、地理标志、婚俗文化的语言特有项。为此,作家刘心武添加 60 余个脚注,或补充文化、地理、历史等背景信息,或提供方言拼音读法,或解释词汇含义。这些脚注可视为一类显著形式的作者声音,能帮助源文本读者理解遍布整篇小说的“京味”语言,解读小说人物形象,也有助于彰显改革开放伊始北京的风俗人情和社会风貌。在目标文本中,代表作者声音的源文本脚注并未直接再现于目标文本,蕴含意义被迁移至译文的字里行间,或以同位语、括号的形式为译文补充释义。本文试举两例,分析目标文本对源文本作者声音的消解^①。

例 1

源文本: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①,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刘心武, 2016: 17)

目标文本:In certain people's eyes, Lu Xichun was one of Beijing's "hutong hooligans", a young man with no prospects and little hope of reform. (Liu, 2021: 17)

本例中,源文本“胡同串子”一词为地道的口语化北京方言,借以形象描述那些常年在老北京胡同里窜来窜去的青少年群体。尽管,作者以“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进行补充描写,具化了该类人群的行为特征。然而对于源文本读者而言,尤其是非北京地域读者,“胡同串子”所指仍有一定陌生性。作者于是添加解释性注释——“住在胡同中的没有教养的青少年”,进一步加深读者印象,促进读者理解。在目标文本中,“胡同串子”及注释被整体转换为“hutong hooligans”,其中 hutong 为“胡同”的音译,保留了典型老北京地理文化意象;而 hooligans 对应“串子”,是为意译,该词泛指在公共场所结伙闹事的年轻人,是目标语读者更为熟知和了解的人物形象。整体而言,“hutong hooligans”也与“football hooligans”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象关联性,使得“胡同串子”所表征之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感知其含义。源文本注释形消义移,转化成意义更直接明了的目标文本,作者声音因而被消解。

例 2

源文本: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①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②,那就更“盖帽儿了”。(刘心武, 2016: 237)

^① 案例中的脚注上标符号为《钟鼓楼》作者在源文本中所加,下划线和粗体均为本文作者所加。

目标文本: Now, how can he get hold of a “steelworker” — a five-yuan coin that has a steelworker on one side? Or maybe even a “unity” — a ten-yuan coin with people of all nations depicted — that would be amazing. (Liu, 2021: 249)

在上例中,源文本使用“钢铁”“团结”二词,系提喻修辞手法,也反映了北京方言的时代性特征。作者分别以第三套人民币五元、十元面值纸钞的正面主景图案指代钱币整体,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简洁、有趣。结合语境来看,此处是作者对后进中学生姚向东成长历程的回顾,对其16岁时因一件登山服与父母争执不下而被“轰”出家门,受饥饿感驱使在鼓楼前大街寻觅吃食时的心理描写。使用“钢铁”和“团结”这样洗练的语言,既显现出姚向东略带“小流氓”气质的人物特征,又展现了青少年历经社会巨大变革后金钱观的大转变。为避免读者不明就里,作者添加了两个脚注——“‘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十元人民币”。在目标文本中,“钢铁”“团结”被分别译为“steelworker”“unity”,不仅保留了源文本中以引号突出词语含义的形式,也使内容具有一定陌生性和新鲜感。为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理解,以同位语分别补充了两个单词的必要背景信息和含义。另外,从同位语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源文本中的一张张纸币,也变为目标文本中的一个硬币(coin)。由此,源文本脚注形转义移,目标文本消弭了作者声音。从形式看,源文本脚注变换为目标文本中的同位语;从内容看,脚注释义被迁移并直现于译文句子内部。

在以上个例分析中,无论是形消义移,还是形转义移,作者声音均被消解。目标文本有效传递了源文本特定词汇意义,并尽可能保持了语言连贯。那么,消解作者声音究竟是谁为之,我们从译者的一篇访谈中或可管窥一二:在翻译中,“有必要确保英语读者与汉语读者拥有相同的语境”,因而需考虑有多少内容可通过译文本身传达,有多少内容需通过副文本来传达;译者可在审视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找到最佳翻译方法,进而“确保以尽可能不显眼的方式向英语读者传递信息,让他们能够按照作者的意图欣赏故事”^①。由此看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具有副文本策略意识,并不排斥在译文中添加脚注或尾注。充分考虑读者阅读能力和阅读需求,采用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是译者一贯的翻译模式。《钟鼓楼》目标文本对源文本作者声音作形式消解,源自译者发挥其能动性。作者声音襄助作为读者的译者,使其能更好理解原文,进而传递至译文。译者不再拘泥于原作形态,通过巧妙转移和解释,以其所推崇的“尽可能不显眼的方式”传达特定文化背景信息,增强译文可理解性,避免添加译注导致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不连贯。因此,显形作者声音被消解,由隐形译者声音

① 电子文学杂志 *Electric Literature* 刊载访谈文章: Translating the Lives of Slackers Drifting on the Margins of Beijing, 程异和 Eric Abrahamsen (陶健) 就合译徐则臣短篇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Beijing Sprawl*) 接受访谈。此处所引来自程异就汉语小说英译阐发其个人观点的访谈内容。参见[2023-08-29][2023-12-13]. <https://electricliterature.com/xu-zechens-collection-beijing-sprawl-book-interview-with-the-translators/>.

所取代。

2.2 浮现译者声音:突显语言异质性

除以上对源文本作者声音的消解外,从目标文本语言本身所体现的异质性也可考察翻译行为者的文本声音。《钟鼓楼》描写聚居在四合院的九个家庭中的主要人物,以及众多与四合院有关的次要人物,共计 80 余角色贯穿全文或客串登场,塑造了一批贴近生活的“小人物”形象。姓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姓名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更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象征意义。例如,薛纪跃、韩向红、姚向东、梁福民极具典型时代烙印和鲜明价值取向;詹丽颖、冯婉姝、张秀藻、于咏枝等人物姓名饱含女性端庄、智慧、美丽、温柔之义。此外,一些人物的命名方式映射其性格特征,“名”与“实”表现出一致性。例如,婚宴帮厨路喜纯,名字与小说中所描述“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形象相得益彰;荀家老三荀磊,借由单名“磊”字所蕴含三石累积之意,突出其在动荡年代牢记“技不压身”的教诲而不断汲取知识,恰恰回照原文“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的描写。更有一些人名虽蕴含积极寓意,但却与真实形象相左,“名”不副其“实”,起到反讽的修辞效果。例如,薛家新娘子潘秀娅,名字显得出尘脱俗,而行为却表现出极强的虚荣心;行政处处长傅善读,并不是人名所示那样擅长读书,喜爱读书,而是善于当面察言观色,背后受贿违规。

源文本中的人名或富有时代特征,或彰显人物形象,或产生反讽效果,为源语读者增添阅读趣味,并引发其对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的深层理解。在目标文本中,一众拥有姓名全称的人名,全部直接以汉语拼音呈现,且是姓在前、名在后的汉语人名独特形式,给小说人物赋予异域身份特质,例如 Xue Jiyue(薛纪跃)、Xue Jihui(薛纪徽)、Meng Zhaoying(孟昭英)。此外,对于少量仅有姓和称谓的人物,运用音译直译结合的方法,采用称谓在前、姓在后的形式,例如 Auntie Xue(薛阿姨)、Old Lady Hai(海老太太)、Chef He(何师傅)、Nanny Zhan(詹姨)。对于偶现的若干孩子昵称名,以意译法传递其名部分含义,例如 Lotus(小莲蓬)、Bamboo(小竹)、Plum(小梅)。除此之外,“卢宝桑”“卢胜七”被拼读为“Luo Baosang”“Luo Shengqi”,这里并不是误译,反而是刻意为之。小说开头部分即出现另一人物“路喜纯”,其姓氏音译为“Lu”,若将后出场的卢氏父子姓氏依然严格音译为“Lu”,则有可能使目标语读者混淆人物关系,因此将“卢”转变为“Luo”。总体来看,除意译极个别人物昵称外,目标文本中遍布拼音形式的人物姓名和姓氏,源文本人名寓意虽流失,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译文语言异质性。

单就人名翻译体现的语言异质性而言,显然也为译者有意为之。译者程异认为,由于

语言和文化差异,“汉语人名的模糊性意义并不能存在于英语”^①。在他看来,“人名是一个符号,所指的是被提及的个人,而不是声音单位的原始含义”;并且,“名称的力量是强大的,翻译行为往往是一种重新命名的行为(an act of renaming)”,为英语读者展现“某种程度的不可知性(unknowability)”也许是件好事,这有利于实现“挑战主流叙事和霸权”的翻译目标;因此,最喜欢的方式是直接呈现人名的汉语拼音,即采用音译的方法^②。在翻译《钟鼓楼》时,译者并非未能意识到人名的丰富寓意,相反,选择音译法以突出异质性,是译者有意主动发声的手段之一。

3 语境声音:形塑译本与推动传播

除文本之外,各类翻译行为者在译本生产、销售、评价过程中,通过不同渠道显现语境声音。在翻译生产过程中,译者、作者、编辑可能会就某个翻译问题进行讨论和商议,各方的通话、邮件、信件等,乃至译者翻译手稿等均可能是各自发声的渠道。这些原始资料对探究译者的工作条件、翻译实践、译者身份以及译者与其他翻译行为者的互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源,有助于构建翻译和译者的“微观史”(microhistory)(Munday, 2014: 64)。进一步而言,翻译档案为探讨翻译的社会功能与地位提供了新载体(Cordingley et al., 2021: 9)。此外,译者、编辑、装帧设计师、校对员、出版商也影响着译本呈现方式,其声音可表现在译本封面、排版、书名、标题、译者序、后记、附录等内副文本。在译本出版前后,出版商会动用资源优势围绕译本生产各类外副文本,通过投放广告、寄送试读本、联系评论家等方式,为译本作有利宣传(Venuti, 2013: 160)。各种副文本所明示的语境声音,不仅影响译本最终形态,还可能引导读者消费、实现广泛传播。本文主要关注《钟鼓楼》英译本的书名、标题、封面等内副文本以及书评形态的外副文本(这些可获得的研究资料也是翻译行为者呈现在目标语读者视野范围内的内容)^③,并以此为切入点,探察翻译行为者的语境声音。

3.1 内副文本:协调“世界性”与“民族性”

书名处于文学作品最显眼位置,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对启发作品主题起到画龙点睛之效。小说《钟鼓楼》中主要人物活动空间是老北京城北钟鼓楼附近一条胡同里的四合院。在时间流逝中,“依旧巍然”的钟鼓楼见证了社会历史变迁和个人命运沉浮,永存的古老建

① 参见译者 Many Englishes, Many Chinese 一文,发表在美国电子杂志 *Poets & Writers Magazine*, 参见[2019-03-01][2023-12-13]. https://www.pw.org/content/the_art_of_translation_many_englishes_many_chinese.

② 参见译者 Naming Rights 一文,发表在英国利兹大学主编的文学类电子杂志 *Stand Magazine* 2017 年第 15 卷第 1 期,参见[2023-12-23]. https://www.standmagazine.org/cgi-bin/subscribe?item_id=2114.

③ 译者就《钟鼓楼》英译接受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Podcast 电台专访。其明确表示,在翻译过程中,就一些自己无法理解的细节问题进行电子邮件咨询,双方讨论由作者刘心武的助理代为转达。本文作者暂未获取相关邮件具体内容。此次专访音频参见[2021-01-31][2023-12-13]. <https://www.historyofliterature.com/378-liu-xinwu-and-the-scar-literature-of-china-with-jeremy-tiang-bharati-sneak-preview-with-mira-s-rajan/>.

筑记录着流变的人情世事。作者在原作中开篇明义,于扉页写下导语“谨将此作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选择以老北京城地标性建筑“钟鼓楼”为书名,既强化书名的象征意义,又能促进中国读者对小说“历史感”“命运感”主题的联想和思考,书名成为“打通时空记忆、联系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合金’装置”(刘军茹,2021:29)。

在目标文本中,A Note on the Text 一页代行序言功能,此处未标明是译者或编辑所撰写,简要介绍原作书名的指称意义、原作评价、“橘瓣式”结构创新等内容。尽管其中明确表示:“此小说中文书名可译为 *The Drum Tower and the Bell Tower*”,然而英译本并未采用此直译书名,而是采纳出版社编辑的建议,将书名改为 *The Wedding Party*(杨玉丹,2022:19)。编辑通过书名改译而显露声音痕迹,原作书名中的城市地标被译作书名里的热闹婚宴。对目标语读者而言,目标文本书名淡化陌生的历史和地域背景信息,凸显全人类共享的婚姻与家庭集体记忆。以书名改译为基础,译本封面设计随之而动。出版商聘任著名图书装帧设计师蒂姆·格林(Tim Green),采用插画师刘新梅的画作为底板,将20世纪80年代北京婚宴场景集中展现于封面。整体以四合院的灰色砖墙为背景色,细致刻画小说中一众鲜活人物形象,并辅以大红喜字、红色爆竹、婚礼撒花等典型中国婚庆文化代表元素,既点明故事背景,又映照小说主题。此外,译本版权页后使用刘新梅的另两幅插画,分别呈现婚宴酒席的杯盘狼藉与小说主要人物居住分布,展现中国式婚嫁习俗的另一面,以及老北京四合院居住文化特点。创造性的封面设计和插画,显现出装帧设计师、插画师的语境声音,不仅描绘具有深刻文化意蕴的人文风俗,传达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与民族精粹,同时也与小说译名及故事支点(即薛家婚礼)交相辉映,为目标语读者创造了鲜明的历史在场感。

另外,源文本第一至六章,以12地支计时法中的“卯”“辰”“巳”“午”“未”“申”为标题,结尾章节以“申酉之交”为标题,将小说故事主线时间涵纳于婚礼当日清晨五点至下午五点,展现中国传统历法文化。目标文本中,每部分标题页,均以竖排形式同时呈现汉字、拼音、英译,表现出汉英双语“语码混用”的杂糅状态。例如,第一部分标题为“卯时”“Mao Shi”“Time of the Jade Rabbit; 5:00 a. m. to 7:00 a. m.”。对目标语读者而言,汉字及其拼音无疑是具有显著异质性的语言元素。为促进读者理解和文化交流,进而对标题中的汉语增加翻译和解释。除将“卯时”译为“Time of the Jade Rabbit”之外,目标文本为该时辰所指的具体时刻作以补充。由此,章节标题页便并存“非翻译”和“翻译”,语言杂糅体现翻译行为者语境声音。这种呈现方式可能受到编辑、译者或其他行为者影响。此举不仅有效再现了中国传统历法文化知识,而且尽可能地考虑到目标语读者阅读能力,确保阅读流畅度。

编辑对书名的改译,简化小说原书名的地域性特征和历史感寓意,强化易于读者产生共鸣的人类共通经验和世界性意义象征;译本封面、插画、章节标题等蕴含丰富年代感和中

国传统文化成分,从另一方面添补历史感和民族性。译者、编辑、装帧设计师、插画师等翻译行为者,协调发声,共同影响译本出版形态,为读者呈现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译本外形。

3.2 外副文本:凸显“人性”和“命运”

译本生产完成后,将作为文化商品进入目标语社会出版市场,与各类图书展开激烈竞争。为使译本获得更广泛的流通与传播,出版商等行为者会对译本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推广,各类书评即为主要发声渠道。《钟鼓楼》英译本出版前,出版商提前一至三个月集中在《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书单》(*Booklist*)、《柯克思书评》(*Kirkus Reviews*)发布商业书评。三家美国出版界深具影响力的书业刊物,不但直接服务于书商、图书馆员、出版商、文学代理人等图书从业者,也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导向出版物”(consumer-oriented publications)的书评取舍标准(Hill et al., 2005:35-36)。译本出版后,多篇专业书评或大众书评陆续刊载于《纽约客》《亚洲书评》(*Asian Review of Books*)、《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刊物或媒体, Five Books、BookBrowse、Complete Review、*Cha Journal* 等在线书评网站或电子文学杂志,以及 East Asi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Literary Quicksand、Smithereens 等个人书评博客。各种不同类型的书评组成译本的外副文本,为译本传播和接受创造语境文本材料,不仅具有广告促销的商业功能(Rockenberger, 2014:263),而且所展现的语境声音,能引导读者携带“先入之见”阅读译本(Munday et al., 2022:203)。

在出版商影响和推动下,书评人通过发表在《出版家周刊》《书单》《柯克思书评》上的三篇商业书评^①,为促动译本传播发出语境声音。以上书评均对小说作出整体式积极评价,称之为作家刘心武“令人印象深刻的”(impressive)、“有趣的”(entertaining)、“代表作”(magnum opus)。除此,对小说主要人物特征和主要事件的介绍着墨较多,未评价译者翻译效果。《出版家周刊》强调:“迷信的薛阿姨,一味追求表面风光……粗鲁的卢宝桑喝醉了酒,对才华横溢但出身低微的厨师路喜纯挑三拣四……坚忍但孝顺的儿媳昭英,努力使婚宴顺利进行下去……”该书评拣选小说核心人物加以性格简描,进一步指出“作家出色地展现了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参加婚礼的其他四合院居民的背景故事和动机。……对近代历史的一瞥让人大饱眼福。”此外,书评人在《书单》写道:“薛阿姨在精心筹备婚礼的同时,也找到了厌烦未来儿媳的理由。受雇的厨师是自立的路喜纯……因地位低下而被忽视。戏曲演员澹台智珠努力保持开朗的外表,以掩盖她同时照顾孩子、丈夫和公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荀磊虽家境贫寒,但却是邻里间出了名的正直、英俊……”小说中的这些代表角色与其他人物一起聚集在薛家的热闹婚礼,“刘心武在这些奇特而滑稽的人物间跳来跳去……探索了人类历史与命运在充满不确定性世界中的融合”。另外,《柯克思书评》

① 摘用书评内容均为本文作者自译。

总结道:“在狄更斯式卡司阵容中的每个角色都经历了一场个人戏剧……不苟言笑的办公室主任……受过英式教育的翻译……做好事却不讨喜的好事之人……事业和婚姻产生冲突的京剧演员……沉默寡言、热情能干的厨师喜纯……”可以看到,尽管每篇书评也都提到小说主体事件的历史背景,点及历史背景对个人命运的复杂影响,将小说人物关联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与变革,这一点不乏是刻意迎合目标语读者趣味之举。更重要的是,书评对小说各色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速描式集中呈现,最终均归结于小说“人性”和“命运”中心思想的升华。书评突出“历史”“个人命运”“内心世界”“人类意义”“哲学思考”等语言要素及话题,对普罗大众而言具有天然亲近性,可能引发其他行为者或读者的认知共鸣和情感共情,此为书评人语境声音关键之处。同时,一定层面上也契合作者创作意图:“通过文献式的叙述与心理剖析,使读者能对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和人物有所发现,促进读者对各种人物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刘心武,1986:6)

三篇商业书评虽为专业书评人所撰,实则与国内版权方和海外出版商的宣传推介策略密切相关。译林出版社对外合作部版权经理表示,双方“共同寻找书中关于人性、家庭、事业等容易引起共鸣的主题,淡化了陌生的时代和地域背景,突出诙谐轻松的风格和人物的细致刻画,书中体现的亲密的人际关系、热闹的社交场合和每个人面对命运挫折坦然接受的态度,更易于被海外读者接受”(杨玉丹,2022:19)。因此,书评人的语境声音实则也代表着出版商意志。总而言之,这些书评不仅是商业性质的宣介材料,更是架构文学作品社会语境意义的重要内容(邵璐等,2022:15)。书评人、出版商等翻译行为者在外副文本发出的语境声音,一方面可能为促进译本流通和传播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试图为目标语读者关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提供话语引导。

4 结语

译者作为语言和文化转换的主要执行者,消解源文本作者声音,发出隐形文本声音;对于人名这一类型专有名词的翻译,着重使用异质性强的汉语拼音,展现显形文本声音。译者通过或隐或显的文本声音,为目标语读者生产兼具可理解性和一定陌生性的译文。译者以灵活的翻译方法证明自身翻译素养,树立译者权威,力图为读者呈现一种译文中未加过多个人介入的印象(Alvstad, 2014: 277),从而构建“邀请读者信任译者”的翻译契约(Alvstad, 2014: 282)。译者、编辑、装帧设计师、插画师等翻译行为者通过内副文本发出语境声音,形塑“世界性”与“民族性”协调共存的译本形态,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小说的全人类意义和当代中国审美旨趣。另有出版商、书评人通过外副文本发声,呈现小说主要人物及事件,突出“人性”和“命运”中心思想,“使读者觉得书评人所评作品为作者原作,而非译者对原作的翻译”(Gullin, 2017: 202),进而强化了翻译契约。宏观来看,多元化翻译行为者

在译本生产、出版、传播等诸环节各司其职、共同发力,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发出文本声音或语境声音。微观来看,语境声音对文本声音起到补充和支撑作用,各类翻译行为者共同维系翻译契约。在译本内外,目标语读者可感知的这些行为者声音,对吸引读者阅读、推动翻译接受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需注意的是,《钟鼓楼》英译本中可能还隐藏源文本作者、编辑、出版商等其他行为者文本声音,未来可从翻译行为者通讯邮件、翻译手稿等一手档案材料进一步挖掘。同时,更多其他类型书评(如学术书评、大众书评)、普通读者自媒体评论(如 Netgalley、Goodreads、Amazon、Facebook、YouTube)等渠道所展露的语境声音,也值得关注和研究。总而言之,系统考察译本内外多元行为者声音及其交互关系,有助于深化翻译生产、接受、传播研究,为当代中国文学翻译传播提供新启示。

参考文献:

- Alvstad, C. 2014. The Translation Pact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3): 270-284.
- Alvstad, C. & A. Assis Rosa. 2015. Voice in Retranslation: An Overview and Some Trends [J]. *Target*(1): 3-24.
- Alvstad, C., A. K. Greenall & H. Jansen. 2017. Introduction: Textual and Contextual Voices of Translation [G]// C. Alvstad, A. K. Greenall, H. Jansen, et al. *Textual and Contextual Voic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17.
- Chesterman, A. 2007. Bridge Concepts in Translation Sociology [G]// M. Wolf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71-183.
- Cordingley, A. & P. Hersant. 2021. Translation Archives: An Introduction [J]. *Meta* (1): 9-27.
- Faria, D., Pinto, M. P. & J. Moura. 2023. Introduction: Reframing Reframers and Their Stories [G]// D. Faria, M. P. Pinto, & J. Moura. *Reframing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as Reframer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10.
- Greenall, A. K., C. Alvstad, H. Jansen, et al. 2019. Introduction: Voice, Ethics and Translation [J]. *Perspectives* (5): 639-647.
- Gullin, C. 2017. Three Voices or One? On Reviews of the Scandinavian Translations of Nadine Gordimer's *Get a Life* [G]//C. Alvstad, A. K. Greenall, H. Jansen, et al. *Textual and Contextual Voic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221.
- Hermans, T. 1996.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 [J]. *Target*(1): 23-48.
- Hermans, T. 2014. Positioning Translators: Voices, Views and Values in Translat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3): 285-301.
- Hill, B. & D. Power. 2005. *The Making of a Bestseller: Success Stories from Authors and the Editors, Agents, and Booksellers Behind Them* [M]. Chicago: Dearborn Trade Publishing.
- Liu, X. 2021. *The Wedding Party* [M]. J. Tiang (tr.). Seattle: Amazon Crossing.
- Millán-Varela, C. 2004. Hearing Voices: James Joyce, Narrative Voice and Minority Translation [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37-54.
- Munday, J. 2008. *Style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in English*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unday, J. 2014. Using Primary Sources to Produce a Microhistory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cerns [J]. *The Translator* (1): 64-80.
- Munday, J., Pinto, S. R. & J. Blakesley. 202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5th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O'Sullivan, E. 2003. Narratology Meets Translation Studies, or, 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J]. *Meta* (1-2): 197-207.
- Rockenberger, A. 2014. Video Game Framings [G]// N. Desrochers & D. Apollon. *Examining Paratextual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Digital Culture*. Hershey: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 Valdeón, R. A. 2022. The Voice(s) of Julio Gómez de la Serna in Oscar Wilde's *Obras Completas* [J].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 220-242.
- Venuti, L. 2013.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何镇邦. 1985. 是独创的,但不完美——谈《钟鼓楼》艺术探索的得失[J]. 文学自由谈(1):135-139+126.
- 刘军茹. 2021. 重读《钟鼓楼》:时空装置、空间焦虑及伦理困境[J]. 北京社会科学(10):28-37.
- 刘心武. 1986.《钟鼓楼》的结构与叙述语言的选择[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9.
- 刘心武. 2016. 钟鼓楼[M]. 南京:译林出版社.
- 邵璐,于金权. 2021. 走出沉寂的贾平凹作品英译: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行为者角色[J]. 当代外语研究(6):89-97.
- 邵璐,周以. 2022. 翻译中的副文本策略与读者接受——以余华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J]. 外国语文(1):10-19.
- 杨玉丹. 2022. 设计内容定制和营销策略 加大社媒宣传力度[N].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2-12-23(19).
- 邹平. 1986. 一部具有社会学价值的当代小说——读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J]. 当代作家评论(2):110-116.

Inside and Outside of Text: Multiple Voices of Agent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Wedding Party*

SHAO Lu LI Weichao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literary works internationally, various translation agents leave their voic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text, either overtly or covertly. In the target text, the translator dissolves the author's voice and presents both an invisible and visible textual voice. Outside the target text, the translator, editor, cover designer and illustrator make their voices visible in the peritexts, shaping a work that embodies both 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ity. Critics and the publisher speak out through the epitexts, highlighting the novel's thematic significance of humanity and destiny. Translation agents have their voices in different ways, jointly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translation pact which facilita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translated work.

Key words: textual voice; contextual voice; translation agents; *The Wedding Party*;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陈宁